

全球智库半月谈

耶伦的五个挑战

美联储缩减 QE 预期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2008 年金融危机与转移中的经济权力：收敛了吗

全球双边-区域贸易谈判热潮下的中国策略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失衡减少了？

为中国三叫好

本期编译

陈 博

丁 工

郭子睿

黄杨荔

孔莹晖

刘兴坤

李 想

彭成义

苏 丹

王雅琦

许平祥

赵 洋

周 乐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 帆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 强	国际金融
	茅 锐	新兴市场	陈 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 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 帆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耶伦的五个挑战 4

导读：2014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最后的正式投票，最终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正式确认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至此，68 岁的耶伦成为了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为了在任期内实现“保护美国工薪阶层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使美国经济在未来数年中延续增长”的目标，并且重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联储，即将上任的她也面临着 5 个严峻的挑战：QE 的正常化；协调美联储的双目标；金融体系稳定性与货币政策框架的融合；提高美联储的沟通和透明度；美联储的监管职责。

美联储缩减 QE 预期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7

导读：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去年夏天新兴经济体复苏的动荡引起了真切关注。本文作者讨论了 2013 年 6 月 QE 的逐步缩减究竟对谁以及为什么产生了冲击。作者研究发现那些规模较大和流动性高的金融市场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并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同时贸易赤字扩大。良好的宏观基本面并没有让其幸免，资本管制也同样无法抵御这些冲击。而最好的预防措施来自宏观审慎政策，即在针对外国资本流入时，允许有限的汇率升值和贸易逆差。

全球治理

经济增长为何越来越难 10

导读：美国经济长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率，但近年来，经济增长越渐乏力。本文作者从人均 GDP 增长率的几大决定因素出发，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

2008 年金融危机与转移中的经济权力：收敛了吗 16

导读：文章分析了过去 50 年世界经济权力转移的情况。通过对 20 个反映经济权力的指标进行加总,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权力没有收敛的迹象，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加速美国的衰落。

经济政策

日本的货币政策：终于走上正轨	18
----------------------	----

导读：在饱受 15 年通缩之苦后，日本终于推出持续的超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作者认为，虽然该政策引发的日元贬值对美国企业造成冲击，但是日本复苏将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障碍难以逾越	21
-----------------------	----

导读：目前,全球正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活跃时期。随着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逐渐退出非常规政策、各国政府改善其财政状况以及金融规制改革的推进，这一活跃基调会进一步加强。一国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际溢出效应。本文认为，这种各国之间宏观政策调整意味着国际合作的日趋成熟，并建议进一步推进这一趋势。

聚焦中国

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有用吗？	24
---------------------	----

导读：正式合同是强化劳工权利的关键。本文列举了一些证据，证明劳动合同法改善了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和低收入劳工的处境；享有社会保险的劳工比例有所增长，且对就业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全球双边-区域贸易谈判热潮下的中国策略	29
---------------------------	----

导读：目前，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框架正被如火如荼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夺尽风头。美国正同时进行三场区域谈判，其中不少都涉及亚太国家。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热潮？作者提出了内外并行的策略，也就是在积极加入现有谈判的同时，开辟新的战场，主导自己的区域贸易框架。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失衡减少了？	33
---------------------------	----

导读：在金融危机之前，巨大而持续扩张的经常账户失衡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自金融危机开始，中美间的经常账户失衡缩水到危机前的一半。本文给出了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减少的启示及相关的政策含义，作者呼吁了重建经济、去除具有压抑消费和抑制货币升值倾向的政策。

战略观察

回顾中国的 2013 年	38
--------------------	----

导读：本文作者对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和评论。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反腐与中国梦倡导两个方面。

伊拉克严峻的斗争形势	40
------------------	----

导读：基地组织已经控制了伊拉克的安巴尔省，马利基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珍·阿拉夫（Jane Arraf）指出，作为什叶派领导人，马利基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都激化了逊尼派的敌对情绪，从而推动了基地组织势力的发展。同时，美军的离开也削弱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

为中国三叫好	44
--------------	----

导读：在几乎无人称赞奥巴马政府的能力和战略时，东亚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导致美国亚太政策的“重大胜利”。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尤其是它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举措。中国的行动为美国提供了调动以美为核心的亚太联盟积极性的机会，促使美及其盟友和伙伴加速提升各自海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唤醒了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与之作对，并加强各自的防务。

伊朗副外长有关伊核问题的演讲	47
----------------------	----

导读：11月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所做的演讲报告，塔赫特·拉万奇是伊朗外交部负责欧洲和美国事务的副外长，同时还兼任伊朗核问题谈判小组的领导人。

本期智库介绍	49
--------------	----

耶伦的五个挑战

David J. Stockton/文 苏丹/编译

导读：2014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就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最后的正式投票，最终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正式确认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至此，68 岁的耶伦成为了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为了在任期内实现“保护美国工薪阶层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使美国经济在未来数年中延续增长”的目标，并且重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联储，即将上任的她也面临着 5 个严峻的挑战：QE 的正常化；协调美联储的双目标；金融体系稳定性与货币政策框架的融合；提高美联储的沟通和透明度；美联储的监管职责。编译如下：

珍妮特·耶伦，这位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即将在伯南克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任期届满后正式掌舵美联储，开始自己的四年任期。她的政策决定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还会影响到各国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拥有丰富经验、充满学术智慧以及敏锐判断力的她，被认为是重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联储的很好的继承者。然而，即将上任的耶伦，也会面临多重前所未有的挑战。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

美联储 2013 年 12 月决定自 2014 年 1 月开始，将每月资产购买总规模从 850 亿美元缩减至 750 亿美元，这一政策的依据是美国经济复苏加快。此外，美联储的 QE 政策旨在对长期利率造成下行压力，从而对抵押贷款市场形成支撑，而目前其已经明显地促进了对利率水平敏感领域的支出，例如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同时，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失业率已经下降到 7% 的水平。

即使如此，美联储仍然要非常小心地对待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规模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成为耶伦的决策要点。在过去的几年里，也经常会出现表现良好的经济指标随后被证明并不成立的情况，此时若是贸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对复苏中的美国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相反地，若现在以一个较慢的速度、较小的规模逐步退出，待经济情况被证实的确良好时，再以一个较快的速度、较大的规模退出，这样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对经济状况仍保持担忧的最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劳动力市场状况虽然显示出改善的迹象，但并未表现出强劲的复苏趋势。尽管耶伦不太可能会在 2014 年 3 月份前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但是从现在开始到那个时候之间执行的决策及所带来的结果，大部分都要由她来处理 and 做出判断。

协调美联储就业与物价的双目标

耶伦长期以来都支持美联储所谓的“双重使命”的政策目标，即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自 2008 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的政策重心大部分集中在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上。考虑到经济危机和缓慢复苏期间劳动力市场遭受的巨大损害，这样的政策重心的确是合理的，然而美联储双目标中的通胀目标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耶伦领导的小组委员会提出全年 2% 的通胀目标政策，最终在 2012 年初被 FOMC 所采纳。然而在过去的一年半中，通胀预期持续低于 2%。私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增长率在过去的一年内仅为了 0.7%，而核心 PCE 价格指数（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影响的 PCE 价格指数）增长率也仅为 1.1%。远远低于目标的实际情况以及市场形成的低通胀预期，给经济复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未预期到的低通胀水平事实上极大地增加了借款人的还债负担。更重要的是，一旦市场上形成了低通胀的预期，名义利率的期限结构就会下移。由于名义利率存在零的最低水平，这样的结果会使得美联储降低名义利率的政策空间更加狭小，当面临突发的总需求的负面冲击时，难以做出有效的抵御措施。因此，如果美联储的确非常重视通胀与就业的双目标，那么就不应该容忍当前的低通胀水平。

金融体系稳定性与货币政策框架的融合

所有国家的央行都在为融合宏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努力，因此期望美联储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一个完全成型的框架并不现实。但在某种程度上，短期内这些的确是美联储做出决定时所必需考虑的因素，而美联储目前仍然没有让公众认识到它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上的一些思考。为此，美联储可能会公开其评估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的指标。事实上，FOMC 已经开始审核一系列的市场指标。公开这些指标，可以给联储的决策提供额外的透明度。

此外，通过向市场表明其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FOMC 可能会引起对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这个问题更大的反思。如果市场参与者都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考虑，美联储的更大的透明度对于其完成金融稳定的目标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政策制定者也可以从这种不断增加与市场的交流中获益。然而，当 FOMC 与市场参与者之间关于金融状况的判断有很大的分歧时，FOMC 将被迫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调整或捍卫自己的观点。在这两种情况

下，公开对外部审查的考虑，都非常有助于提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析质量。

提高美联储的沟通和透明度

在过去的 20 年间，美联储一直在致力于如何提升公共沟通技巧，向市场、国会以及公众有效地阐释美联储的政策，这样的做法不仅加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进一步明确了机构所承担的责任。虽然这在伯南克时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需要耶伦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在美联储已经准备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期。FOMC 可以在每次会议上更新预测的情况，耶伦主席也应该在每次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些预测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决定的含义，精心准备的讲话可以使得她更好地向公众传达委员会的观点，并准确阐述影响美联储决定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其余的 FOMC 成员应当减少一些公众场合的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FOMC 中不同观点的存在正是美联储体系的一个优势所在，委员会的成员正是通过向公众传达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政策制定者在这个困难而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不同方面的思考。但这种传达的方式并不是毫无约束。

有效执行美联储的监管职责

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给人们带来的一个毋庸置疑的教训就是监管的失效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包括美联储在内的银行监管部门，并没有察觉和阻止市场上日益累积的投机行为，后者最终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样的经历显然是不能再次发生。然而，为了更好地执行多德-弗兰克法案，许多有效的措施还有待实施，关于法案的许多调整和相关的监管政策也非常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得到具体执行。虽然耶伦并不需要关注具体的微观管理措施，但是她仍然需要保证她和她的团队能够理解一些关于金融监管及美联储相关职责的战略性思维，并且可以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

本文原题为“Five Challenges for Janet Yellen at the Federal Reserve”。本文作者 David Stockton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华盛顿宏观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此外，他还担任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研究和统计部门主任。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缩减 QE 预期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Barry Eichengreen, Poonam Gupta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去年夏天新兴经济体复苏的动荡引起了密切关注。本文作者讨论了 2013 年 6 月 QE 的逐步缩减究竟对谁以及为什么产生了冲击。作者研究发现那些规模较大和流动性高的金融市场遭受了最严重的冲击，并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同时贸易赤字扩大。良好的宏观基本面并没有让其幸免，资本管制也同样无法抵御这些冲击。而最好的预防措施来自宏观审慎政策，即在针对外国资本流入时，允许有限的汇率升值和贸易逆差。编译如下：

2013 年 5 月，美联储官员开始讨论逐渐减少其购买证券的可能性，数量从每月 850 亿美元缩减至较低水平。2013 年 5 月 22 日，伯南克主席在国会的证词中提出逐渐缩减的可能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时刻。这种“逐步缩减预期”对新兴市场经济和金融状况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

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注意：

- 不仅是强烈的影响，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这种冲击是惊人的。最令人震惊(有人说危言耸听)的评论家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新兴国家可能面临危机全面爆发，类似于 1994 年的墨西哥和 1998 年的亚洲。
- 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不同国家受到影响而有所不同。
- 美联储的 QE 逐渐缩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抱怨，但与早期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视为“货币战争”的批评相比，好比小巫见大巫。

最新研究

在一篇最新的论文中，作者试图阐明这些问题(Eichengreen 和 Gupta, 2013)。作者使用新兴市场的截面数据，分析谁受到美联储逐渐缩减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文章关注 2013 年 4 月（“逐步缩减预期”之前）和 2013 年 8 月期间（届时主要响应已经完成）各国汇率、外汇储备和股票价格的变化。

此外，作者计算了整体金融市场的综合压力指数。该指数是外汇储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变化值的加权平均。构建的方式类似于 Eichengreen(1995)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其中权重是每列标准差的逆。首先使用汇率和外汇储备损失数据创建基础指标，然后添加负的股票收益率的变化值。为了获得权重，使用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的月度数据，为每个时间序列数据计算标准差。标准差的倒数即为权重。

然后我们探索影响这些变量的几类可能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 可观察到的反映基本宏观经济状况的变量，包括预算赤字、公共债务、外汇储备和 GDP 增长率。
- 一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和开放度。
- 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余额等对资本流动较为敏感的指标受管制的程度，特别是在量化宽松尚未有退出预期，而且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指定者对“货币战争”满腹牢骚时这些指标的受管制程度。

结论：谁受到逐渐缩减预期的影响，为什么？

基于以上的指标分析，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 没有证据表明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国家(较小的预算赤字、较低的债务、更多的储备、更好的增长率前景) 外汇储备损失会相对较小，汇率和股票价格下跌也不见得更加缓和。
- 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规模。投资者寻求再平衡自己的投资组合主要集中于那些金融系统规模比较大和流动性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些市场中，投资者可以在不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出售资产，实现投资组合再平衡。与之相比，明显相反的情形发生在金融系统规模较小和流动性较差的所谓前沿市场。这是给予人们一个提醒，日益增长的金融部门的成功是一把双刃剑。它将加重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

-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早期预期阶段，允许汇率升值和大量的资本流入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逐渐缩减预期之后，将感受到最大的影响。
- 容易融资时，允许经常账户赤字显著扩大的国家将受到最大的影响。

使用宏观审慎政策的国家——繁荣时期允许实际汇率有限上升和经常账户赤字有限扩大，发生的逆转最小。

抱怨 QE 的国家遭受“逐步缩减预期”的冲击

这些结果提供了一些直接证据，那些量化宽松时抱怨的国家，在量宽退出时仍然抱怨。因为量宽期间他们的资产价格被允许大幅上涨，他们的经常账户也相对显著的扩大，现在逐渐缩减预期对当地市场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解释缩减预期对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时已经考虑进了各国实行的宏观审慎政策——无论他们是积极的、消极或中性。回想一下，我们控制了财政政策的状态(因为在资本流入时，财政紧缩也可以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此外，我们控制了之前资本管制的强度；同样，在逐步缩减预期影响上，这些因素看起来也没有产生持续的干扰。

显然，无论是资本管制，还是财政紧缩，甚至两者的组合，都不足以抑制金融资本流入的影响。相反，一个更广泛的系列宏观审慎政策，适度的汇率上涨和经常账户赤字——限制银行贷款的增长率，抵押贷款市场监管和类似的措施——会相对更加有效。

总结

我们探索 2013 年夏天美联储逐渐缩减资产购买的影响，收获了以下结论。首先，在前期量化宽松时允许最大的实际汇率升值和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的新兴市场，在逐步缩减阶段表现出较大的货币贬值、外汇储备损失和股市下跌。第二，基本宏观经济状况指标(预算赤字、公共债务水平、外汇储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表明，更好的基本面并不意味着是更好的绝缘体。除了之前实际汇率的上涨和经常账户赤字，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一国的金融市场规模的大小。更大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在逐步缩减预期影响下，承受了更大的汇率、外汇储备和股票市场的压力。这是因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规模较大和流动性较强的国家，在寻求平衡投资组合时更容易和更方便。这表明拥有一个大型金融市场将意味着喜忧参半，因为这更容易受到来自境外的金融冲击。

最后，没有证据表明资本控制或财政紧缩能为免于遭受逐步缩减预期冲击提供保护网。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应对外国资本流入时，广义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用来抑制本币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赤字扩大。该模式指出，一旦逐步缩减预期再次到来，哪些国家将更容易遭受外部压力。

本文原题为“Tapering talk: The impact of expectations of reduced Federal Reserve security purchases on emerging markets”。本文作者 Barry Eichengreen 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Poonam Gupta 为世界银行研究员。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经济增长为何越来越难

Brink Lindsey /文 李想/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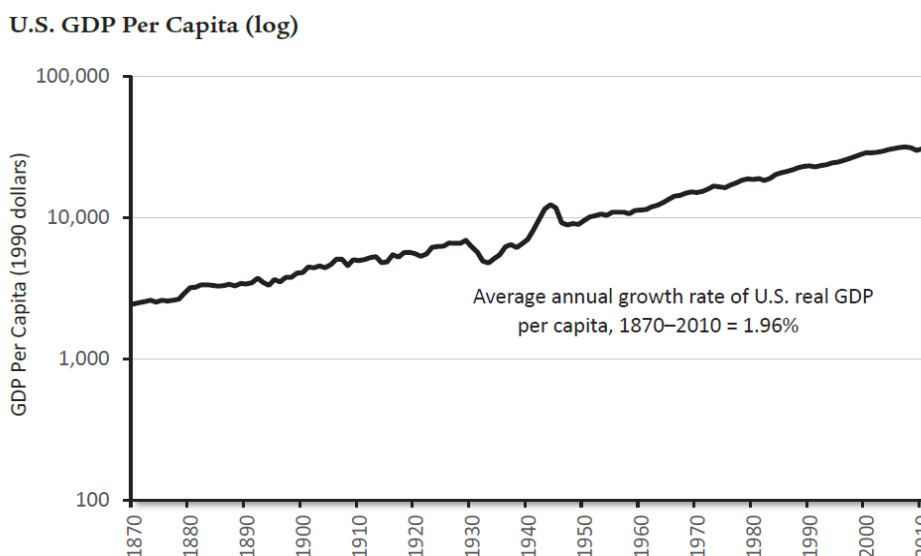
导读：美国经济长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率，但近年来，经济增长越渐乏力。本文作者从人均 GDP 增长率的几大决定因素出发，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编译如下：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相当平稳。尽管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都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均 GDP 却一直保持在约 2% 的增长率。然而，这种平稳增长的态势能否在未来持续，非常值得怀疑。

人均 GDP 的增长率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劳动参与率或人均工作小时数的增长；（2）劳动力质量，或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的增长；（3）资本深化程度，或者说劳动力的人均物质资本投入；（4）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经质量调整过的每单位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水平。

在整个 20 世纪，以上这些因素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不断地变动。然而，各自的消长基本都互相抵消，因此人均资本增长率得以长期维持在 2% 的稳定水平。但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种抵消效应可能不再成立，因为所有决定因素将同时恶化。

图 1 美国人均实际 GDP 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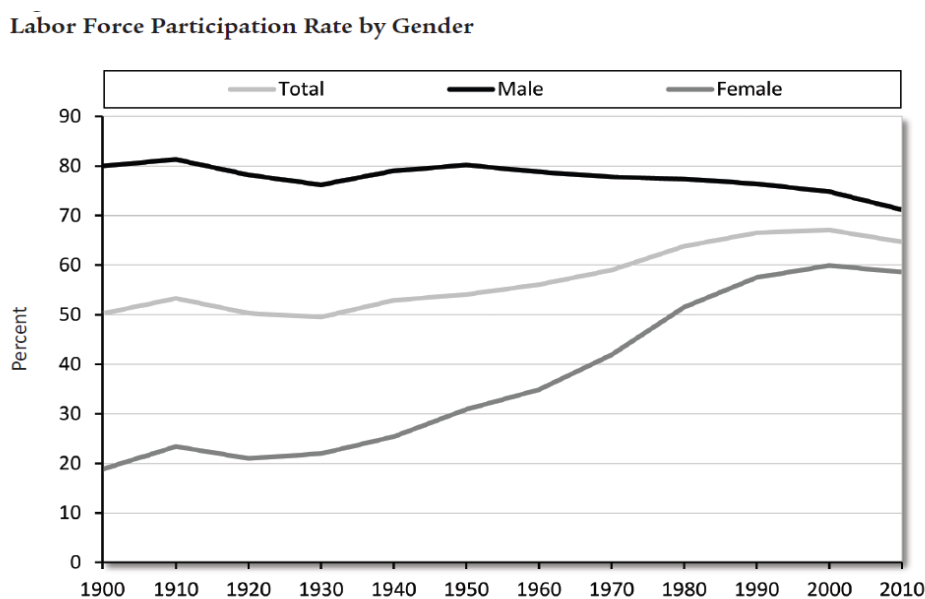


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工作时间

在其他水平保持不变时，劳动力的增加一定会带来 GDP 的增加，因为更多的工人就意味着更多的产出。但要达到更高的人均 GDP 水平，劳动力的增长率必须高于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参与率¹要提高。

如图 2 所示，20 世纪美国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主要归功于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劳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1900 年的 18.8% 上涨至 2000 年的 59.9%，这使得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从 50.2% 增加到 67.1%。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时间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增长和退休年龄的提前，人们有推迟劳动参与年龄的动机，导致劳动参与率在近期出现了下降。2012 年整体劳动参与率为 63.7%，这是 197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要维持人均 GDP 的稳定增长，亟需努力使劳动参与率回升。

图 2 1900-2010 年美国劳动参与率



Sou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但是，任何提升劳动参与率的努力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阻碍。25-54 岁之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最高，在 2000 年，这一年龄段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43.6%，55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数则占总人口的 21.1%。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 2000 年最高年龄是 54 岁，也就是说，整个婴儿潮一代的人口都处在最主要的

¹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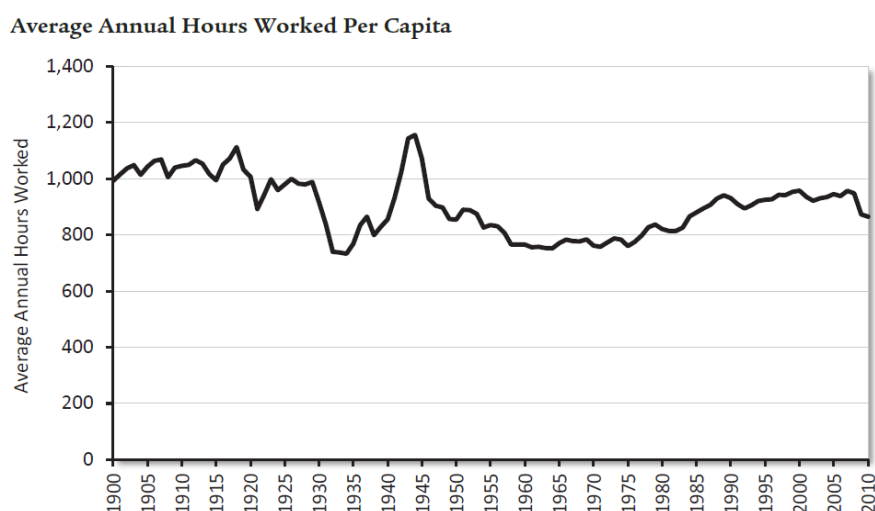
劳动参与年龄。然而，在 2000 年之后，这一批人开始进入老年，主要劳动年龄区间的人数规模相对缩小。2010 年，25-54 岁年龄段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已降至 41.2%，据人口普查局预测，到 2020 年，这一占比将进一步降低到 38.7%。由此看来，劳动参与率的回升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衡量美国人工作努力程度的指标，并不是劳动参与率，而是人均工作小时数。如图 3 所示，除去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猛跌和二战时期大动员带来的猛升，1900 年到 1964 年人均工作小时数的整体趋势是逐渐下行。

不难发现，劳动参与率的走势与人均工作小时数的走势不同。20 世纪人均工作时间的减少，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薪酬较高的那部分劳动力会追求更多闲暇，这种福利的改善并不能在 GDP 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还有另一部分原因是一部分年轻的美国人从工作中转移出来去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劳动参与率与人均劳动时间变动的此消彼长使得人均 GDP 的变动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趋势。

根据 2011 年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劳动力增长只为 GDP 的增长贡献了 0.4 个百分点，并且预计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劳动力的增长只能为 GDP 的增长增加 0.5 个百分点。麦肯锡估计，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人均劳动力产出必须增加 34% 才能将美国的 GDP 增长维持在可被接受的水平。

图 3 美国年度人均工作小时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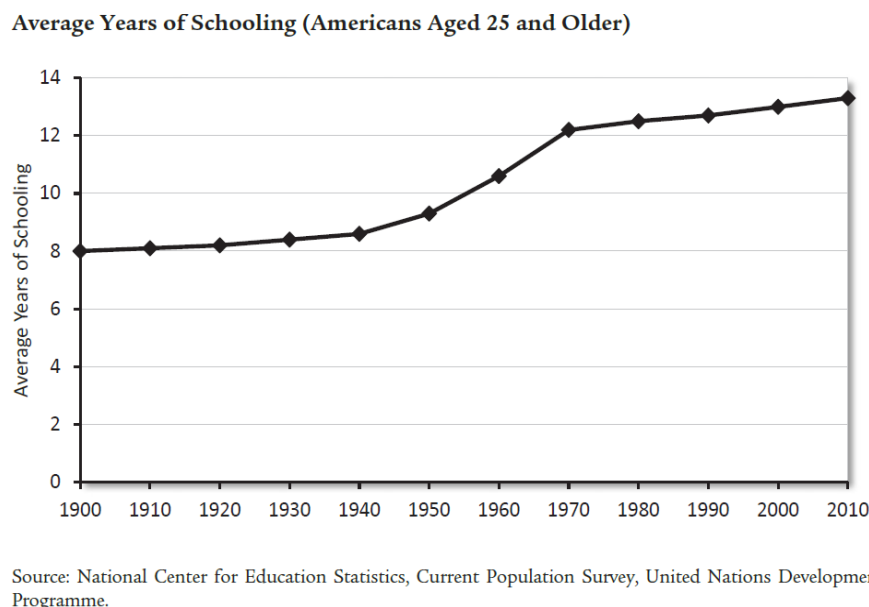
Source: Valerie Ramey,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人力资本

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标准之一是受教育水平。如图 4 所示，20 世纪美国劳动力质量变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受教育年数的明显上升。从 1900 年到 2000 年，25 岁及以上年龄的美国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上升了 63%，从 8 年增加到 13 年。

经济学家估计教育繁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当重要。据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估计，1919 年到 2005 年之间，由于受教育年数增加带来的劳动力质量的提升能够解释人均实际 GDP 增长的 15%。然而，这一增长动力在最近几十年逐渐衰弱。现在的高中毕业率实际上要低于 1970 年的水平，而且年轻男性接受大学教育的程度与 1980 年的水平相仿。从 1940 年到 2005 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下降了 37%。

图 4 美国平均受教育年数



展望未来，劳动力质量的增长很可能进一步放缓。根据哈佛学者戴尔·乔根森的研究结果，从 2010 年到 2020 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平稳化和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渐退休，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面临停滞，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可能在 0.06% 左右。如果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真实可信的，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下降，21 世纪的经济增长环境将会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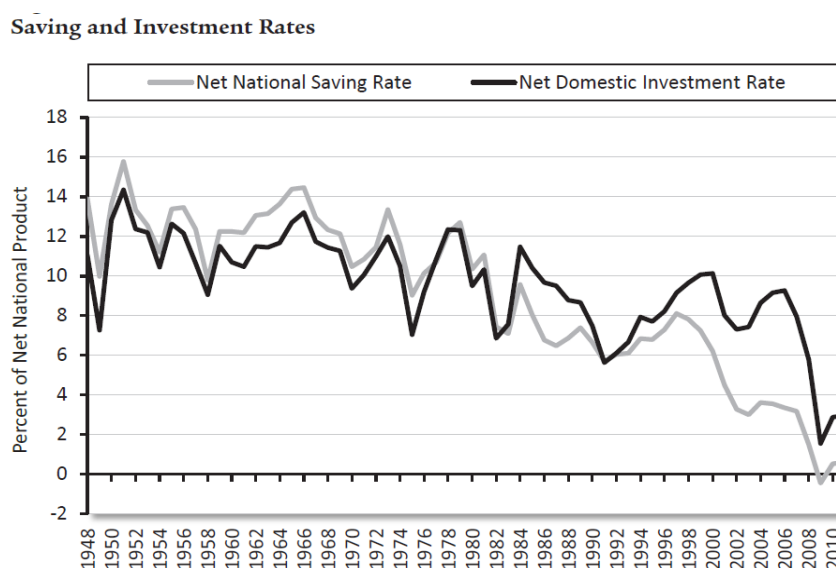
储蓄率和投资率

一定程度上，厂房和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增加也能带来人力资本的增加。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核

心力量；另一方面，资本深化，或者说人均物质资本的增加也能改善单位时间的产出水平。因此，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

在一定条件下，高投资率与更好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关联。而美国的资本积累水平几十年来一直在降低，如图 5 所示，净投资占净产出的比例在近几十年持续下降，与净储蓄率的降低趋势一致，这也表明经济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

图 5 美国储蓄率与投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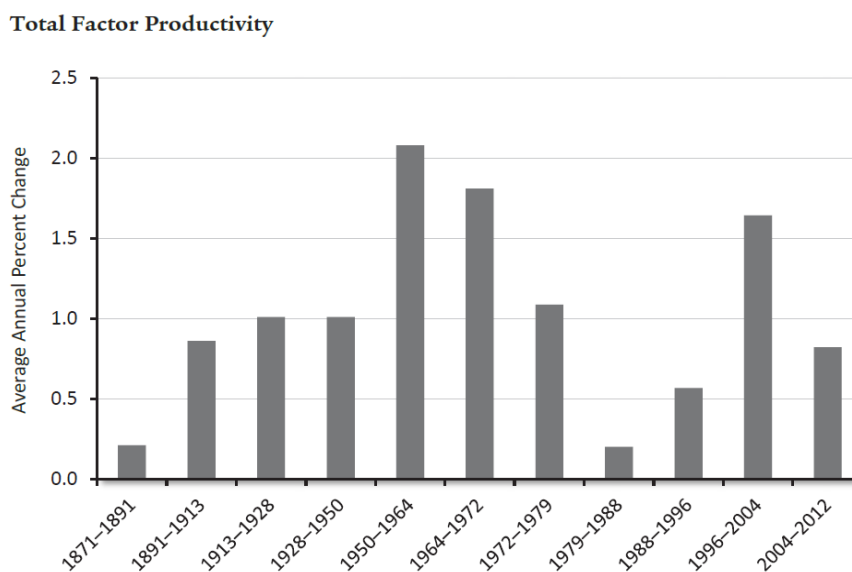
Sou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创新

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于创新。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在达到某个水平之后，增加劳动力或资本的投入将无法带来更多产出。所以，发明新产品或生产工序至关重要，这样就可以在既有的投入水平下增加产出。经济学家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一指标来衡量创新活动对产出的促进作用。

目前看来，人均工作小时数在下降，提升劳动力质量的受教育程度在下降，资本积累的水平也在下降，因此，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才能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如图 6 所示，从 1870 年到 1995 年，TFP 的增长率经历了一个明显上升的浪潮，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又迎来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上涨过程。具体来说，TFP 增长率在 20 世纪中期达到峰值，70 年代开始下降，1996 年 2004 年又开始回升，但是近几年又逐渐走低。

图 6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Source: Robert Gordon,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对于 TFP 增长率在 20 世纪的上涨和下降，目前并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但是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 10 年当中 TFP 增长率的走高，经济学家基本都同意信息技术（IT）是其背后推力。自 2004 年之后，对 IT 业投资的减少和 IT 对产出推动作用的减弱，使得 TFP 增长率回落到 1996 年之前的水平。那么，TFP 增长率是否能在未来得到提高呢？这没有定论，但 90 年代的炙手可热的半导体的价格已在近期逐渐走弱，这或许意味着 TFP 增长率回到高位的可能性较低，创新活动可能也将变得越来越难。

综上，促使人均 GDP 增长的各种组成要素同时都在衰退，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低增长无法避免，其中一些因素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在今后发生改变。尽管如此，依然很难否认经济增长将变得越来越难这一结论。因此，如果想再现稳定的增长，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友好政策将会成为关键。

本文原题为“ Why Growth Is Getting Harder? ”。本文 Brink Lindsey 为 CATO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是 CATO 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文章，于 2013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08 年金融危机与转移中的经济权力：收敛了吗

Manmohan Agarwal, Sayan Samanta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文章分析了过去 50 年世界经济权力转移的情况。通过对 20 个反映经济权力的指标进行加总,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权力没有收敛的迹象，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加速美国的衰落。编译如下：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收入增加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1965-1973 年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收入增加额的比重不到 13%，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比重上升到 25%。2000-2007 年间，这一份额进一步上升到 40%，金融危机期间世界收入的增加几乎全部由发展中国家贡献。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出口增加额的份额也不断上升。而且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份额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突飞猛进，由 2005 年的 46%上升到 2011 年的 55%。亚洲国家的这一份额高达 60%。

资本流动也出现同样的情景。发展中国家的 FDI 资本流入由 2007 年的 26.9%上升到 2009 年的 42.9%，FDI 资本流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但规模远远小于发达国家。

经济规模的变化

通过比较过去 50 年 GDP 规模最大的 25 个国家与 2011 年 GDP 规模最大的 25 个国家，发现：尽管各个国家每年的经济表现存在很大差异，但 25 个国家的排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巴西和韩国发生了较大变化，分别上升了 5 个名次和 9 个名次。2011 年和 2007 年排名的相关系数为 0.97，2011 年和 1965 年排名的相关系数为 0.83，这充分说明 2011 年经济规模排名高度依赖于过去 50 年的经济规模排名。因此，在过去的 50 年里，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对经济规模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GDP 以及人均 GDP 相对美国的变化

把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与美国人均 GDP 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经历三个阶段：第一，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相对美国人均 GDP 不断上升。第二，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相对美国人均 GDP 基本稳定或略微下降。第

三，本世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 GDP 相对美国人均 GDP 再次上升，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同样，主要经济体的 GDP 相对美国的 GDP 也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又上升的过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过高，GDP 总规模虽然不断接近美国，但人均 GDP 的差距依然很大。

衡量经济重要性的指标

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权力意味着能够影响市场的运转和商品的价格。显然，GDP 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经济权利的指标。作者通过对 20 个反映经济权力不同维度的指标进行加总，建立了衡量经济权力的新指标，其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包括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科研支出占 GDP 的比重、科研人员的数量以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

通过对各个国家的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从 1990 年到 2005 年，主要国家经济权力大小的排名无重大变化。只有中国上升 9 名，韩国和以色列上升 4 名；加拿大下降 5 名，墨西哥和巴基斯坦下降 4 名。第二，2009 年的经济权力指标排名与之前并无明显变化，说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导致世界经济权力发生重大转移。第三，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越来越接近，但这种接近的速度越来越慢，到 1982 年之后几乎陷入停滞。

结论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权力随之增加。他们的 GDP 在向美国收敛的过程中，速度越来越慢，到 1982 年之后几乎陷入了停滞。而且，人均 GDP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通过对 20 个指标加总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权力没有收敛的迹象，2008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加速美国的衰落。

本文原题为“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and Shifting Economic Power: Is there Convergence”。本文作者分别为 RIS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顾问。本文是 RIS 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的货币政策：终于走上正轨

Phillip Swagel / 文 孔莹晖 / 编译

导读：在饱受 15 年通缩之苦后，日本终于推出持续的超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作者认为，虽然该政策引发的日元贬值对美国企业造成冲击，但是日本复苏将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和维持国家安全。编译如下：

日本经济衰退了二十年后，日本央行终于接受经济学家的建议，开始采取行动了：通过超常规货币政策来摆脱通缩，改变因通缩预期产生的企业和消费支出延迟的现状。2013 年 4 月，日本央行增加了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量，以期实现 2% 的通胀目标。

该政策初见成效。2013 年 11 月，核心通胀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化之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 0.6%。虽然通胀水平依然很低，但这是过去 15 年来的最大升幅。持续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工资上升，由于消费者不再等待价格下跌，消费将复苏，最终企业的投资和雇员数量都会增加。

和许多批评者一样，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认为，如果日本央行坚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日本是可以走出通缩的。早在 1999 年，伯南克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时便批评了日本央行的不作为。

考虑到日本经济复苏有助于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全球复苏，并希望日本央行能够接受“新鲜的观点和方法”，如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摆脱通缩，2003 年，作为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再次以更客气的方式向日本央行提出建议。

该批评并不夸张但引人注目，因为央行开动印钞机，并用于政府支出，最终将提高物价。然而，在外界期望日本央行印钞时，日本央行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或许正如克鲁格曼所猜测的那样，日本央行担心因政策失败而丢脸。

美日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独立于政府之外，以免政府为了选举而导致通胀水平过高。然而没有料到的是，日本央行竟如此无能，使日本通缩长达 15 年之久。这为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提供了经验教训。

日本复苏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都有好处。经济方面的好处包括了美国出口增加和投资回报率上升。如果日本能坚持安倍晋三首相承诺的广泛的结构改革，如开放竞争，包括外资企业的竞争，美国的收益会更大。其中一个开

放市场的举措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日本、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将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

安全方面，日本复苏为日本壮大军事力量提供了经济基础，从而有助于美国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尽管安倍晋三很不明智地重提二战，中国“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除了日本以外还有菲律宾和越南。更强大的日本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60 名参议员和 100 多名众议员指责日本的复苏政策。在 TPP 谈判中，他们签署协议，支持“强制性的货币操纵准则”，这有点荒谬。

这可能是由于许多签署的议员希望奥巴马总统留心中国的货币政策，尽管中国并不是 TPP 成员国。日元不断贬值是他们签署协议的重要原因。福特汽车公司 CEO 艾伦·穆拉利对此直言不讳，抱怨日元贬值为日本竞争对手带来不公平的优势。

从 2012 年 10 月日本央行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起，日元开始贬值。目前日元兑美元、欧元汇率跌至五年低位。日本的量化宽松规模越大，日元贬值越厉害——这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知识。此外，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都会推高美元兑日元汇率。

换言之，日元贬值是日本在美国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呼吁多年后推出适当政策的自然结果——该政策对日本和美国都是最优的。比起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来使美元贬值，为美国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日本算不上操纵汇率。

美联储确实希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扩张来使贬值美元，但其最终目的是提振美国经济。2013 年 7 月，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日本的做法与美国相似，而中国使人民币一直维持在均衡汇率之下，才是真正操纵汇率。

对奥巴马总统而言，国会试图将汇率操纵纳入贸易协定是一个政治问题。完善的 TPP 协定将成为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为数不多的经济成就之一。

然而除了政治之外，美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美国贸易协定中的强制性的汇率操纵规定被巴西利用（巴西指责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使巴西雷亚尔升值），要求美联储提高利率，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总言之，在经历了 15 年通缩后，日本终于接受建议，推出持续的超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该政策导致的日元贬值给与日本出口企业竞争的美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但是，日本复苏将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

本文原题为“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Finally on track”。Phillip Swagel 是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障碍难以逾越

Olivier Blanchard, Jonathan D. Ostry 和 Atish R. Ghosh/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目前，全球正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活跃时期。随着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逐渐退出非常规政策、各国政府改善其财政状况以及金融规制改革的推进，这一活跃基调会进一步加强。一国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际溢出效应。本文认为，这种各国之间宏观政策调整意味着国际合作的日趋成熟，并建议进一步推进这一趋势。编译如下：

国际政策协调就像尼斯湖水怪（The Loch Ness Monster），被讨论得很多但是却很少看得见。回顾几十年前或更早的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策协调曾经只是一段插曲。

当世界面临一些灾难性情况，核心经济体为了避免产生连锁性负面溢出效应，国际政策协调似乎就在这种动荡时期自发产生。在世界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国际政策协调虽然不是闻所未闻，但也很少存在，例如卢浮宫协议和广场协定。

现在，各国宏观政策协调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离我们远去，世界各地决策者也几乎没人否认经济回归稳健增长的可能性，但他们开始担心一国政策会通过多条渠道进行国际性传导。

政策协调的变迁与经济危机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溢出效应波及范围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相互连接的这一事实。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相关文献一般认为这些跨国溢出效应非常小，但是最近的迹象表明，此类跨国溢出效应十分可观，这反映了国际贸易规模和金融一体化程度在与日俱增。此外，在全球经济波动时期，溢出效应通常会更大。

跨国溢出效应的外部性也说明了政策工具相对于政策目标的并不充足，这意味着一国将很难不受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传导的影响。如果政策工具的数量等于政策目标的数量，政策合作和非合作的结果将相同，那么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全球经济危机的遗产——高额公共债务、近乎于零的利率水平和时有发生国内政治混乱，这意味着现在的政策决定者拥有更少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其多元化目标。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宏观政策跨国协调所产生的效益可能会大于“大稳定”时期的情况。

财政刺激的国际协调与单边货币政策

国际政策协调偶尔会发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范围内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就是一个例子。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会产生正面的跨国溢出效应，因此通常被认为能够改善全球福利。同时，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发生作用——与只有部分国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情况相比较，每个国家都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要少。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出现的协调性经济政策的其他例子还包括，设置避税天堂、承诺不通过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方式来刺激总需求。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各国的目标并不是追求政策协调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其中一个例子是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货币区（美国联邦储备和日本银行）并没有对他们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进行协调，而只是出于国内目标。但是，这种政策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似乎非常大。那么，国际集团为什么没能够从国际政策协调中获得潜在利益呢？

国际溢出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某些学者强调，国际政策协调的国际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关于其规模甚至利弊都未达成一致意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增加其他国家对该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正的溢出效应），但是也会导致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负的溢出效应）。正如关于“货币战争”的争论所指出的那样，政策实施国家和被动接受国家对政策的国际净溢出效应（产出效应和汇率效应）的规模或者符号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此类争论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国际效应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政策工具变得非常规、国际溢出效应也更加不确定。

国际溢出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各国更不能忽视政策协调的结果。国家 A 可能实施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政策，但是国家 B 可能实施不利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作为一种谈判策略可能会被意识到，但是很难能够据此达到政策协调的成果。其他学者还讨论了限制政策协调利益的其他障碍，包括不注重国内政策权衡和全球经济内在的不对称性。

逾越宏观政策协调的障碍

我们能够从成功的政策协调案例和不成功的政策协调案例中学到什么呢？第一，必须明确在克服各国单方面解决本国问题方面，合作和不合作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同时，还需要明确的是，每个国家应该如何为增加全球福利做出贡献。如果政策协调意味着所有国家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都采取扩张

性财政政策，或者避免竞争性贬值政策，那么国际协调将会更加易于解释，也更容易实现。反之，如果政策协调的含义较复杂，那么国际协调将会更加难于解释，也更难以实现，尽管理论上的好处很多。

我们能够采取一些更好的措施吗？似乎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的陪审员”来明确国际溢出效应的性质，进而简化合作性成果的确立和维持。IMF 作为一名陪审员已经在成员国家的监督下发挥着这一作用，识别国家之间与日俱增的相关性，在认识国际溢出效应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IMF 能够帮助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既有利于各国的利益，又有利于全球利益。

我们能够更多地做些什么呢？目前，并不存在单纯的、互利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大国的经济政策会对小国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但是小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够影响大国的经济状况。

那么，存在限制这些负面溢出效应的规则吗？这些规则的逻辑似乎是强制性的。关于规则，当经常账户背离经常账户规则太远时，我们可以采用警告的形式或者更强有力的措施；当一国的资本账户的某些方面过于不平衡时，则继续采用信贷或者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的形式。

结束语

关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我们的所闻通常多于所见。要想获取国际政策协调方面的好处，我们仍面临非常严峻的障碍。为了突破这些障碍，我们需要识别可能会带来较多利益的时机，并为了实现这些情况下特定协调成果而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国际协调不能够带来收益，我们也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大国应对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明显负面效应负责，那么我们需要给出可行的补救措施。

本文原题为“Overcoming the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macro policy coordination is hard”。

本文作者 Olivier Blanchard 为 IMF 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D.Ostry 为 IMF 研究部制度问题部门副主任，Atish R. Ghosh 为 IMF 研究部副主任。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有用吗？

Richard B. Freeman 和 Xiaoying Li/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正式合同是强化劳工权利的关键。本文列举了一些证据，证明劳动合同法改善了
中国劳工，尤其是农民工和低收入劳工的处境；享有社会保险的劳工比例有所增长，且对就
业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编译如下：

2007 年，中国制定了新劳动合同法（LCL），这是近十年来首次实施的重要劳工体制改革，意在对企业施压，促使其为劳工提供书面合同，以帮助劳工增强其合法权利。因为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增长和企业利益胜于劳工福利，中国历史上劳动法的推行一直很弱（Tang, 2008），甚至许多劳工遭到雇主虐待（Lee, 2007; Chan, 2001）。许多企业未与数以万计拥有农村户口的劳工签订合同，也不保障他们的合法社会福利与其他权利。若不支付社会保险，企业能节约 20% 至 30% 的劳工成本。对农民工和低收入劳工支付低于其全额工资或法定加班费的工资，能够增加企业的边际利润。如果没有书面合同，劳工就难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证明其所受的不公待遇，因此许多劳工通过罢工和公众抗议的形式来应对。

经过热烈的公开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 LCL，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法案的特征在于，它强调企业必须依法与劳工签订书面合同。政府希望劳工能通过合同而非靠地方官员或劳动局督察维护自身权利（Cooney 等，2013）。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关于该法案的讨论强化了工人保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增强了其对法纪的需求（Gallaghe 和 Dong, 2011）。北京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的立法支持者之一）的支持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再忽视劳工所遭受的非法待遇。该法案明确了负责推行并惩处不守法雇主的群体，要求这些雇主每月给没有合法合同的劳工支付双倍工资。即便如此，考虑到企业与地方政府忽视劳动法的历史，许多人对 2007 年的 LCL 能否改善劳工福利有所质疑。保守派反对者认为，如果它有效，也会因提高劳工成本、减少就业，从而弊大于利。

为评估新法案对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劳工的影响，研究者检验了：

- 新法案推行前后劳工取得个人合同的可能性；
- 持有个人合同与获得社会保险之间的关联性；
- 新法案通过后，取得合同对获得社会保险的影响。

通过分析涵盖不同地区及劳工群体的数据集，许多研究者（包括我们）总结：与认为 LCL 无效或有害的观点相反，LCL 提高了持有个人合同和社会保险的劳工比例，并可能诱使企业将更多工作外包给“被派遣的劳工”。

下面四点总结了这些结论背后的证据。

1、新法案和持有书面合同的劳工

我们首先考察 LCL 对劳工合同情况的影响。许多数据表明，新法案推行后，持有合同的劳工比例上升了，例如：

- 中国住户收入项目（Gao 等，2012）
-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Gallagher 等，2013）
-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Zhou，2013）
- 中国城乡迁移调查（Cheng 等，2013）
- 珠三角农民工调查（Freeman 和 Li,2013）

表 1 第 1 行显示了法律推行前后珠三角调查的结果对比情况：2006 年，40%的农民工持有合同； 2008（2009）年，59%（60%）的农民工持有合同。

表 1 珠三角调查中的合同覆盖率和社会保险的劳工比例（以年计）

	2006	2008	2009	Change 2009-2006
1. Contract coverage	43	61	62	19
2. Medical insurance	33	47	52	19
3. Age insurance	22	35	38	16
4. Injury insurance	43	56	57	14
5. Unemployment insurance	8	14	20	12
Number of observations	2613	2093	1721	

来源：Freeman 和 Li(2013)。

回归结果显示，合同覆盖率的增加反映了法律推行对具有相同特性的劳工的区别。为进一步确定因果关系，我们估计了原本没有书面合同、于 2006-2008 年首次获得合同的劳工比例，即获得合同的“风险率”。图 1 表明，2008 年 1

月推行新法案前后，风险率出现了一次跳跃，从 2006-2007 年的每月 1.1% 增加到 2008 年的每月 7.1%。

图 1 劳工获得首份合同的月风险率



来源：图 1 来自 Freeman 和 Li(2013)。某个月获得合同的风险率指该月首次获得合同的劳工数量与所有无合同劳工数量的比率。

我们进一步将增加的合同覆盖率分解为：

- 法案推行后，同一家企业雇佣的劳工获得合同导致的覆盖率；
- 法案推行前/后，首次找到工作的劳工的合同覆盖率差异，以及从无合同企业迁移到有合同企业的劳工的合同覆盖率差异。

最主要的因素是对同一家企业雇佣的劳工的政策变化。与此相同，Cheng 和 Yang (2010) 在一项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中发现，LCL “显著提高了合同签署率，延长了合同期限，并增加了非定期劳动合同的数量”。

2、合同覆盖率和社会保险

政府希望，书面合同能增加劳工获得法定社会保险及其他保护的可能性。以上数据都显示，有合同的劳工比能力相当的无合同劳工获得社会保险的可能性更高。我们认为，合同将导致珠三角农民工获得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的可能性提高约 15%-20%，这可谓最重要的两项社会保险。我们还发现，有合同的劳工被拖欠工资的概率更低，且更有可能形成工会。

3、持有新合同的劳工获得社会保险

合同覆盖率的增加、持有合同与社会保险的截面关系表明，LCL 增加了社会保险和合同覆盖率。事实上，与新法案推行前相比较，法案推行后的社会保险大幅增加了。首先，如图 1 第 2-5 行显示，珠三角农民工中获得四种形式法定保险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12% 上升到了 2008-09 年的 19%。因为该调查并未询问农民工以前的工作是否有社会保险，我们无法衡量社会保险的增加是否主要源于获得合同的劳工。以享有社会保险者的特质为基础，我们分别估计了法案推行后劳工首次获得合同的概率，及法案推行前无合同劳工享有社会保险的概率。与我们的结果一致，面板数据中合同和保险情况的变化表明，首次获得合同尤其是长期合同的劳工很可能获得社会保险（Gao 等，2012，表 3）。

4、为规避法案，企业将工作外包给“被派遣的劳工”而非裁员

自 2008-09 年全球衰退影响中国就业状况以来，很难通过前后对比找到该法案对总体就业情况的影响。据此，我们依靠经理人调查来评估该法案对就业的潜在不利影响。珠三角调查问道：

- 你所在的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吗？
- 你的雇主迫使现有合约终止并重新确立新的雇佣关系吗？

在 2008 年的调查中，仅有 4.6% 的受访者反映其所在企业自 2007 年起有过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仅 1.68% 反映了第二项内容。人民银行对制造类企业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新法案降低解雇率的经理人（31%）几乎是认为新法案降低雇用率（16%）的两倍（Gallagher 等 2013，表 10）。这些报告中，没有证据表明新法案导致了大规模失业。

企业与政府似乎通过将工作转移到临时帮助机构——这些机构派遣劳工到企业——来对新法案做出反应，因此强化了此类劳工的增长趋势。但 Yu Zhou（2013）借助 2008 年和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派遣劳工的分析显示，被派遣劳工与其他正规部门的劳工中签订合同的比重大致相当。人民代表大会非常关注被派遣劳工人数的增长，以至于 2012 年 12 月给法案增加了新规定，以规范分包行为。

结论

尽管劳工法在中国的总体推行力度较弱，然而，劳工合同法增加了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劳工的合同覆盖率，提高了享有法律授权的社会保险的劳工比

例，且对就业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尽管许多劳工依旧没有书面合同或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朝其目标——将法律传播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迈进了一步。在多数劳工制度已经停滞或恶化的时期，LCL 有助于改善中国劳工的处境。

本文原题为“Has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worked?”。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Richard B. Freeman、中山大学讲师 Xiaoying Li。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双边-区域贸易谈判热潮下的中国策略

Yifan Hu/文 陈博/编译

导读：目前，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框架正被如火如荼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夺尽风头。美国正同时进行三场区域谈判，其中不少都涉及亚太国家。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热潮？作者提出了内外并行的策略，也就是在积极加入现有谈判的同时，开辟新的战场，主导自己的区域贸易框架。编译如下：

世界贸易组织(WTO) 159 个成员国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即“贸易便利化”协议。该协议旨在全球层面简化通关手续。尽管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就，但 WTO 的权威性日益受到众多双边协议和排他性区域经贸协定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目前正在同时进行三场重要的经贸谈判，分别与亚太国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PP”)、欧洲(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TIP”)及所谓的“真正友好的”国家(服务贸易协议，简称“TISA”)进行贸易协定的磋商。在全球贸易走势持续低迷、贸易摩擦加剧、世贸组织成就甚微、全球逐步适应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背景下，新一波特惠贸易协议正在来临。

面对着贸易孤立的风险，同时为了更好地处理中国当前面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中国必须针对 TPP 和 TISA 制定出“内部”及“外部”两种战略。

“内部战略”意味着中国直接参与 TPP 和 TISA，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获取美国能源资源而从中受益。重要战略举措如下：

- 利用其自身市场的规模增强议价能力，以加入谈判并进而参与塑造 TPP 和 TISA 的结构。积极促成与 TPP 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对话，寻求获准加入谈判的机会或寻机对谈判施加影响。
- 利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参与 TPP 和 TISA，但保护经济中最具战略性的行业，如电子和金融业。
- 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与 TPP 和 TISA 同步进行。经济结构再平衡将证明向 TPP 标准靠拢的合理性。
- 通过共同参与 TPP 和 RCEP，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 加快建立自由贸易区, 以此作为 TPP 和 TISA 的试点工程, 并适度扩大该试点计划, 为经济向更高的贸易和服务标准迈进做好充分准备。

“外部战略”则使用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手段, 旨在保留中国专业化优势与生产要素禀赋。具体战略包括:

- 推进 RCEP 的发展, 这有可能在 2025 年前将中国 GDP 提升 0.5%, 从而抵消 TPP 所导致的贸易转移为中国带来的冲击。这一冲击可能将 GDP 降低 0.09%。
- 通过加入 RCEP 来逐步推进国内标准的提高并保持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比较竞争优势, RCEP 成员国较 TPP 而言具有更小的排他性, 并可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 通过双边协议促使日本和韩国积极参与 RCEP, 因为如果这两国参与 TPP, 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将会对 RCEP 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 审视美国传统的伙伴国家在 RCEP 框架内的战略方针, 以避免协议被架空。
- 促进并完善 RCEP, 建立亚洲地区的基础性银行, 并更积极地尝试解决食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国家安全和南海问题。
- 积极准备并建立基于 RCEP 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 继续在世界贸易组织扮演积极角色。
- 在大型贸易区进展困难时, 继续发展双边贸易协议。

“内部战略”与“外部战略”之间并不互斥, 而是互为补充, 两者都旨在实现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长期目标, 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结构性改革, 还将进一步促进整个地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作者还特别对 TPP 做了一个深度分析。作者对 TPP 的主要目标归结如下:

- 取消亚太地区的关税障碍, 促进经济一体化。
- 使 TPP 成为全球区域协定的模板。
- 更新贸易监管的结构, 使之适应全球价值链一体化、电子商务和高新技术的发展等内容。原产地规则也将被采用。这意味着, 只有一件商

品的原产地国家也加入了 TPP 协议，该商品才能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

- 更好地监管国有企业。
- 提升亚太地区的劳工标准。这部分协议或许将参考 ILO 宣言中提到的五条国际通行准则，并可能加入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长和职业安全等内容。
- 提升环境保护标准。
- 将商贸流通从非成员国中抽离。
- 监管电子商务。

从公开资料中，作者统计了 TPP 谈判国对现有条款的立场。负数代表不赞成现有框架，正数代表支持。从这个分数统计来看，美国是目前条款的主要支持者。因此，TPP 的美国烙印十分明显。而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和越南）是现有条款的主要反对者。考虑到两国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要加入 TPP，中国也会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中国应该和这些国家协同谈判，使得条款更加照顾这类国家的利益。

TPP: country positions (6th November, 2013)

	Australia	NZ	US	Peru	Chile	Mexico	Canada	Singapore	Brunei	Malaysia	Vietnam	Japan	Total
Market access chapter	5	2	7	7	2	5	1	2	4	-4	0	-1	30
Rules of origin chapter	2	3	6	0	4	1	5	5	5	3	0	2	36
Customs chapter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9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chapter	0	1	1	1	2	2	0	1	1	0	0	-1	8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chapter	-1	3	-1	1	2	2	1	3	2	2	2	1	17
Government Procurement	0	2	0	2	2	0	2	0	0	-2	0	1	7
Competit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hapter	-1	1	-1	0	1	-1	-1	1	1	0	0	1	1
Investment chapter	0	5	-4	3	6	0	0	4	5	4	2	2	27
Services chapter	3	3	1	1	1	3	1	3	3	3	3	3	28
E-Commerce chapter	2	2	4	5	3	5	4	2	2	1	-1	5	34
Environment chapter	5	7	7	1	-3	2	5	3	5	-3	-1	1	29
Labour chapter	1	2	1	1	1	-3	1	1	1	-1	1	2	8
Legal chapter	2	-2	1	-2	0	-2	0	-4	-2	-1	-2	0	-12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apter	-5	-8	7	-5	-9	-8	-7	-4	-9	-7	-9	-8	-72
Total	12	20	30	14	11	5	11	16	17	-6	-6	8	132

Source: Wikileaks, HTI

Note: accept=+1, reject=-1, reserved position=0

大多数国家对原产地条款都非常支持。这意味着，中国不加入 TPP 的话可能会遭受较大的排挤。

那么，中国加入 TPP 的好处是什么呢？

学者的分析显示，中国加入 TPP 的好处要大于加入东盟 1+3 协议的好处，这是因为市场容量的扩大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流量。数据显示，中国和 TPP 现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跨部门贸易（各国生产不同部门的产品，发挥比较优势），而非部门内贸易（各国生产同一部门，不同工序的产品）。这符合我们的观察：TPP 的成员国向中国净出口农产品，而中国向它们净出口工业制品。这样的贸易结构对市场容量的敏感度更高，这就使得中国加入 TPP 后，由于 TPP 本身的市场规模就相对更大，中国的贸易量增幅也会相应提升。

相对而言，中国加入 TPP 的损失主要有几点。首先，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将面临更严格的约束。第二，严格的劳工条款将会推高中国的劳工成本，削减其竞争力。第三，对国企的监管限制将导致和中国经济结构的冲突。第四，TPP 的要求或许会和中国经济开放的预设时间表产生矛盾。第五，地缘战略的考量或将使国与国之间谈判更加复杂化。第六，美国能源资源在 TPP 框架下的开放对于中国的好处并不是太明显。这是因为港口投资的花费将部分抵消从美国进口天然气的优势。

本文原题名为“China’s Trade Agreements: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trategy”。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刊于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网站，作者为 Yifan Hu。[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为什么失衡减少了？

Joshua Aizenman, Yothin Jinjarak, Nancy P. Marion/文 王雅琦/编译

导读：在金融危机之前，巨大而持续扩张的经常账户失衡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自金融危机开始，中美间的经常账户失衡缩水到危机前的一半。本文给出了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减少的启示及相关的政策含义，作者呼吁了重建经济、去除具有压抑消费和抑制货币升值倾向的政策。编译如下：

危机前的失衡

危机前世界的一大特征是巨大的经常账户失衡。2008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世界GDP的0.7%。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世界GDP的1%。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此大幅失衡仍将持续。Dooley et al. (2003)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可长期选择以汇率低估和资本控制为支撑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发展战略也是有利可图的，美国可以通过亚洲对其金融资产的高需求从而在长期保持经常账户的大幅赤字。

以Aizenman, Lee (2007, 2008)为代表的新重商主义学派则对始于2000年的长期全球失衡不那么乐观。与早期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情形相似，2000年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利用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出现了巨幅经常账户盈余及巨额外汇储备。金融危机前夕，中国真实GDP增长率已达到14%（如图1），而其经常账户盈余达到了GDP的10%（如图2），外汇储备占GDP比例则达到45%，并于2010年达到顶峰50%（如图3）。然而，现代重商主义可能导致贸易囤积，过度竞争会造成全球贸易伙伴间的紧张气氛。

图1 中国的GDP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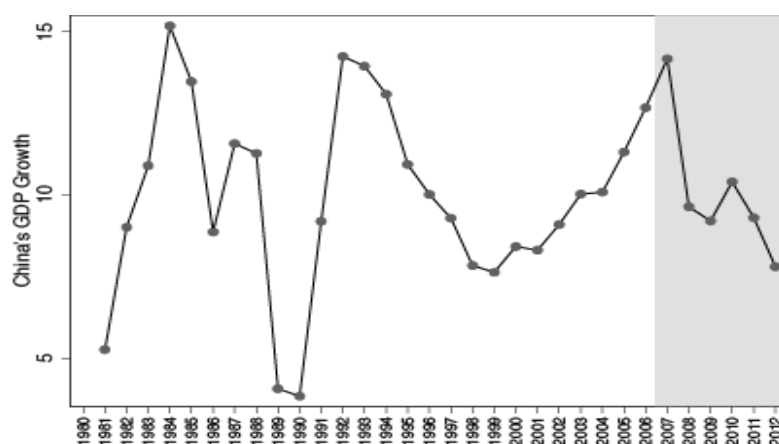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经常账户/GD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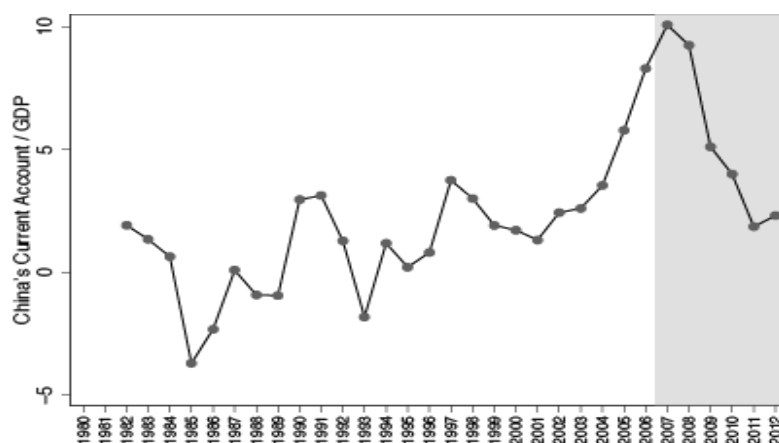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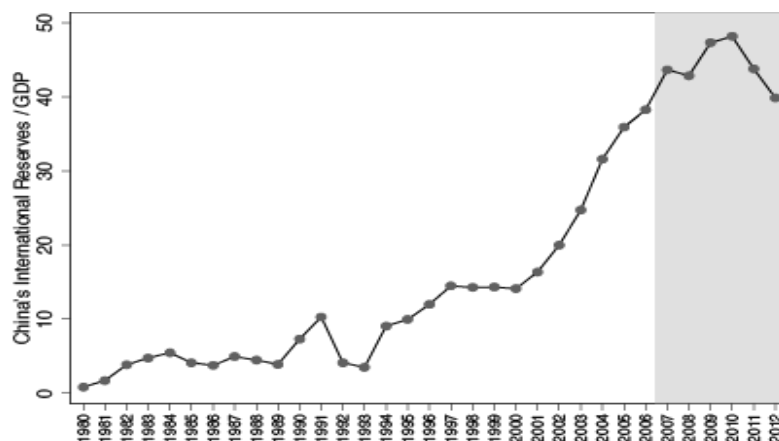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外汇储备/GDP (%)



来源: Aizenman et al. (2013)

危机后的失衡

金融危机爆发了。在美国，私人部门被强制去杠杆化，并减少对进口品的需求。一些被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同样减少了进口。伴随着外部出口需求减少，中国开始利用信贷扩张来促进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中国政府还推行了财政刺激政策，并开始允许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建立主权财富基金、鼓励直接对外投资，中国政府希望将其现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

自金融危机开始，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失衡迅速下降。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2007年占GDP的10.1%下降到2012年的2.3%（如图2）。2009年的下降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2005年和2006年都为美国GDP的6%，07年为5%，而2012年便下降到2.8%。

为什么经常账户失衡减少了？

经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可以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的迅速减轻作出清楚的解释。对于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金融摩擦和家户的去杠杆行为减少了进口需求和总需求，从而减少了它们的经常账户赤字。有大规模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例如中国，将发现其出口需求急剧减少，并会经历经常账户盈余的下降，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会进一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

在 Aizenman et al. (2013) 中，我们利用面板回归分析得出了危机前后，经常账户余额和经济变量间重要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这种相关性在危机前后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危机后，中国正在寻找高收益率的外国资产。这一转变也表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减少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减速会成为新常态。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中国更加依赖国内需求来扩张经济，而持有外汇储备的高成本会推动中国更多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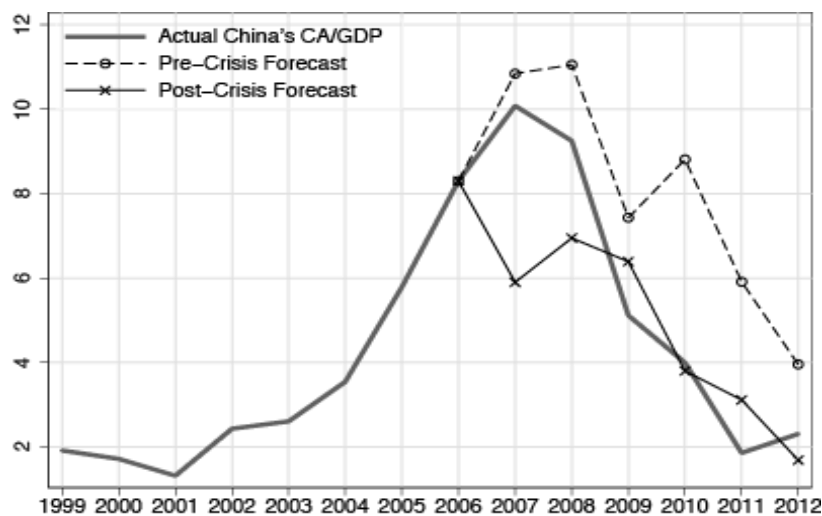
估计方法

我们收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80-2012 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其它经济变量数据。回归结果表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再是其它国家出口需求的重要国家。由于房地产和证券资产价值的下降，美国私人部门被迫去杠杆化。私人和公共部门都发生了巨大调整，这使美国不能再大量吸收世界的出口。

- 金融危机前，盈余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与外汇储备的增加，贸易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增加是正相关的。
- 金融危机后，前两项变量的相关性变得不显著，而与美国需求间的相关性变成了显著负相关。

图 4 给出了 1999-2012 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走势。与事实一致，危机前的预测表明，经常账户盈余/GDP 比例一直在下降，而危机后下降的程度则被低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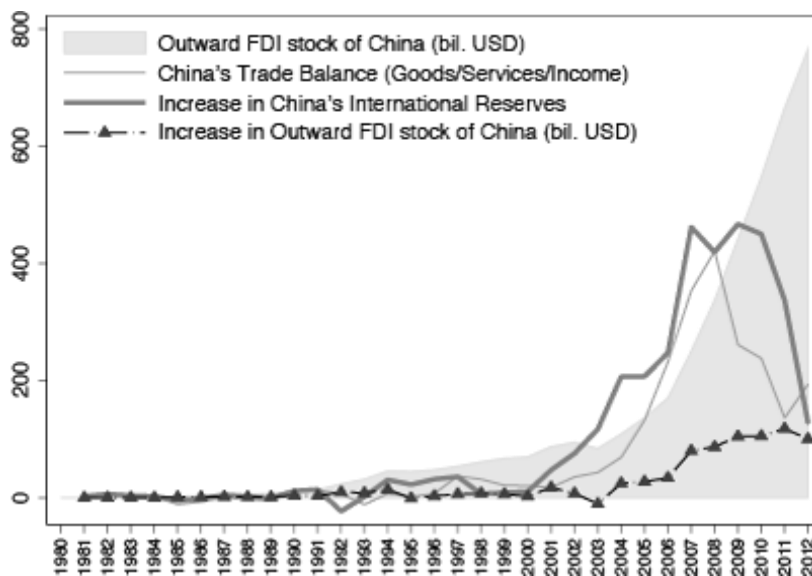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经常账户预测：危机前：1983-2006 危机后：2007-2012



来源：Aizenman et al. (2013)

最后，我们检验了最近 33 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和对外 FDI 的变化（如图 5）。我们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向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贸易盈余、国内信贷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根据危机前和危机后做了分段检验。

图 5 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向外直接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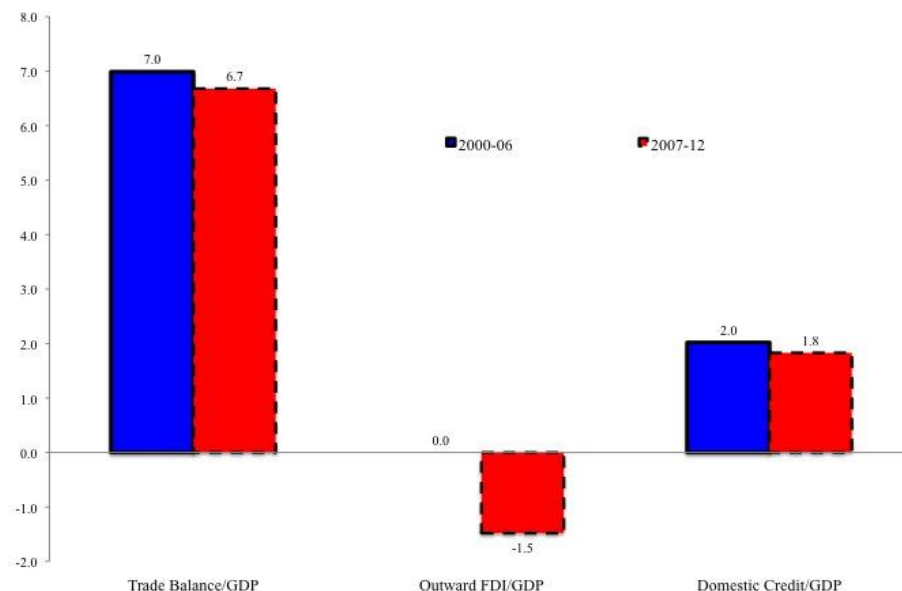


来源：Aizenman et al. (2013)

我们在图 6 中总结了中国外汇储备变化的来源。图 6 画出了变化来源变量变动一单位对外汇储备占 GDP 比重的影响，表明：中国的贸易盈余对其外汇储备的影响在危机前后都非常对称，国内信贷的影响在危机前后的影响也差不多

相似，而 FDI 的影响则发生了变化，在危机前，对外 FDI 对外汇储备影响微弱，但危机后影响却变得相当显著。

图 6 中国外汇储备/GDP 变化来源



来源：Aizenman et al. (2013)

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中国的国内投资已达到 GDP 的 50%，国内信贷则达到了 GDP 规模的近两倍。另外，中国的储蓄率也超过了“黄金法则率”。中国在危机早期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大规模刺激有效地阻止了 08-10 年间的经济硬着陆。然而，这些政策都无法替代消除所有抑制中国消费、阻止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样的经济改革将带来更低的经常账户盈余、非贸易部门的加速增长及外汇储备的减少。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也会转化成外资股权和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原题为“China’s growth, stability, and use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s”。本文于 2014 年 1 月刊于 vox 时评，作者为 Joshua Aizenman, Yothin Jinjarak, Nancy P. Marion。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回顾中国的 2013 年

Kerry Brown / 文 周乐 / 编译

导读：本文作者对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和评论。他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是反腐与中国梦倡导两个方面。编译如下：

在习近平作为中国一把手的头一年里，施政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方式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声誉，二是努力在全世界面前塑造中国越发富裕强大的形象。

第一个方面主要针对中国的腐败现象。2002 年以来，中国醉心于财富的累积，更快更大规模的进行多种投资，金钱变得无处不在。对许多官员而言，这是一个尴尬的时期。政府官员们是致力于改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繁荣的人，但现实中获益成为百万和亿万富翁的却是企业家和商人。这样一来，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则需要面对更多来自金钱的诱惑。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情况变得更糟糕，部分国有企业经不住巨额利润的引诱，腐败飙升。对此，中国公众对共产党官员的声誉评价直线下降，大多数人甚至认为政府官员只会维护与自身相关的狭隘利益。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天就谈到了腐败问题。2013 年他对该问题没有做出过多评论，但从行动上进行了回应。共产党内部许多无视国家法规、在豪华餐厅大吃大喝的官员均受到批评。除了政府机构外，近 120 家有关国企也都正处于调查当中。这次调查无疑是一个对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影响重大的举措。2012 年 9 月，中共就薄熙来腐败、滥用职权一案进行了审理，判处其终身监禁。中共高层的这些行动似乎都在表明，未来中国的反腐将不会再仅存于口头上。

习近平对腐败的大力治理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私人根源。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享有很高声誉的人之一。因此他的儿子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渴望通过反腐工作来提高党的道德合法性，重塑老一辈党员的优良作风，使中国共产党员从对钱的过分关注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性的政治力量。另外，开展反腐工作还具有战术意义，因为目前中国不再单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如同中国追求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一样，中国政府官员通过大量攫取国有及非国有企业财富的现象也将成为过去。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更加健康，习近平提出了第二个工作主题——中国梦。未来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翻番，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和创造中产阶级社会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普通公民在生活富裕、物质富有的情况下，其内心需求变得更加紧迫。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政府逐渐意识到仅有 GDP 的增长无法产生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国内某些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也正是习近平使用“中国梦”这一概念的内在意义。

这当然要实现中国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极其复杂，战略空间十分有限。美国始终在施加压力，希望日本和印度与中国竞争。此外，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台湾、香港、西藏、新疆都有不安定因素。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公众认为，中国目前就是处于一个复杂矛盾的阶段，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关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当初拒绝承认中国的地位，但之后却产生了中美 G2 的想法，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成就和地位的认可。在此看来，中国梦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国家做出的承诺，成为“富裕强大国家”的承诺。这一承诺的实现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更多的外国人则担心中国在本国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也会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化。

本文原题为“China 2013: A Year in Review”，本文作者克里·布朗，为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致力于中国经济政治的研究。本文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刊于 CHATHAM HOUS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伊拉克严峻的斗争形势

Bernard Gwertzman/文 赵洋/编译

导读：基地组织已经控制了伊拉克的安巴尔省，马利基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珍·阿拉夫（Jane Arraf）指出，作为什叶派领导人，马利基政府采取的很多政策都激化了逊尼派的敌对情绪，从而推动了基地组织势力的发展。同时，美军的离开也削弱了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编译如下：

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叛乱已经导致马利基总理威胁要进攻极端分子所控制的费卢杰地区。“这是以生命为赌注的反抗”，资深记者珍·阿拉夫（Jane Arraf）表示，她注意到马利基总理现在正面对着在4月30日将要开始的选举之前的最严峻的挑战。当马利基所领导的什叶派政府正在为政权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许多逊尼派人士“他们事实上被从政治舞台上排除掉了”，阿拉夫说道。

问：美国军队离开之后的伊拉克是什么样子的？

答：如果你到那里去并且在巴格达旅行的话，如果你不是在一个自杀性爆炸现场附近的话，你就会发现周围一切都正常。这里充满了沮丧，但是一切都是正常的。人们沮丧是因为尽管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生活并没有什么改观。这是一个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能够生存下来。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具有多重面孔的国家。但是它确实不是美国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时希望它成为的那种国家。

问：你是怎样看待马利基的政府的呢？

答：这是中东地区唯一的由什叶派政府，而其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感觉到自己必须为政权的生存而战斗，也许他们确实如此。他们一开始以为海湾阿拉伯国家试图削弱他们，而现在则确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安巴尔和其它地区的逊尼派抗议者是受基地组织支持的。基地组织的目的在于颠覆中央政府。因此它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对什叶派政府的恐惧，因为它们被充满敌意的邻居所包围，不能生存下去。

问：马利基政府受伊朗的影响有多大？

答：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影响很大，因为伊朗是什叶派国家，因此马利基政府就是伊朗的傀儡。我并不认为并非如此。马利基政府一直在试图独立地制定政策，

以及独立地推动政府的运转。但是它确实同伊朗的联系非常紧密，同时同其它国家的联系也很紧密。

问：叙利亚的战斗影响到伊拉克的教派冲突了吗？

答：当叙利亚开始动荡的时候，人们担心那里会出现教派冲突。从那个角度来看，叙利亚的冲突是一种代理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伊朗——中东地区主要的国家之一，以及叙利亚最大的支持者和本地区的其它国家。因此像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其它一些海湾国家都将叙利亚看作是战场，在几个世纪以来可以第一次通过颠覆叙利亚政府来削弱伊朗的力量。

当我最初同逃离叙利亚的人交谈的时候，教派冲突还不像现在那么严重。如果具体说那里的情况对于伊拉克的影响，那就是尽管伊拉克政府关闭了边界，外部因素仍然可能渗透进来，因为它不能完全控制边界，因此武装分子也是进进出出。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伊拉克看到的情况：数百名隶属于基地组织的叙利亚武装分子已经来到了伊拉克。

问：这种情况怎样影响安巴尔省的局势呢？

答：安巴尔是伊拉克最大的一个省，可能是情况最复杂的省之一，那里非常部族化，非常保守，甚至萨达姆也不能完全安抚这些部落。这也是当美国军队进入这一地区时面对的问题。你也许还记得 2003 年的一件事，当时美国士兵在费卢杰的一个屋顶上对抗议者开火，从而引起一系列的悲剧事件。接下来就是当地人杀害美国承包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敌对、怀疑和流血事件的地区，不用做什么事情就可以点燃他们的愤怒。

因此对于基地组织而言，费卢杰是一个很合适的发展势力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可以对人们说，“在这里有异教徒。他们不会理解你们的。他们不会尊重这里的妇女，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奴役你们。”同这里的安全真空相伴随，基地组织可以在部落的帮助下发展壮大。不过部落却反对他们，因为基地组织夸大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想要控制那里的每一件事情。部落真正想要的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因此他们排斥基地组织，并且同美国军队联合起来。基地组织被赶出了这些城市，然后美国人也离开了。然后，基地组织又回来了，而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在于这里再一次成为煽动不满的合适地区，因为马利基政府不承认逊尼派的需求，而逊尼派则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被承认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开始寻找替代性的选择，无论这些选择多么的遥不可及。

问：几周前当你在安巴尔省的时候，你都感受到了什么？

答：去年以来那个地区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它已经被分隔开了。费卢杰和拉马迪就在这其中。伊拉克军队切断了安巴尔省同巴格达的联系，而巴格达距离那里仅仅有四十公里。伊拉克政府和安全部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担心那将成为巴格达大量的自杀性人体炸弹和其它爆炸的来源。安巴尔地区的居民进入当地十分困难。那里有大量的安全检查站，迫使许多人不能离开。

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安巴尔或费卢杰发生，在巴格达周边的许多逊尼派地区也是如此。在星期五你就不能进入或离开某些逊尼派地区，因为安全部队担心在周五祈祷后的抗议活动。这种分裂在去年明显加深了，但是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是导致马利基政府拆除在费卢杰的逊尼派抗议营地的原因这一，而这又引发了基地组织进入这一地区并且在两周前控制了费卢杰和拉马迪的部分地区。

问：拉马迪的部落显然是反对基地组织的。

答：一些部落确实如此。在拉马迪他们有时候好像会和伊拉克警察力量联合起来，有的时候则是几个部落联合在一起同基地组织战斗。我已经接触到的报告指出，在这些战斗当中他们成功地在拉马迪的大部分地区击退了基地组织。但是他们不能永远坚持下去。对于基地组织而言，我们要知道它的人员都是受到充足的财政支持的，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并且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包括经常从事自杀性爆炸。这些事情很难应对，甚至对于训练有素的安全部队而言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仅美国，而且伊拉克政府也放弃了应对这些事情。

问：既然伊拉克军队被反复地赶到城市以外，那么费卢杰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答：去年军队总体上是被排斥在城市之外的。在一项同部落达成的交易当中，伊拉克政府同意将军队撤走。因此费卢杰的安全是由部落武装力量和当地的警察来维持的。现在军队都被部署在安巴尔省郊外临近费卢杰的地区，正在等待马利基进攻这座由基地组织所控制的城市的命令。

如果军队进攻，那就会是灾难性的。看起来马利基不太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也承认这样做的危险。你不能轻易地不受欢迎的、没有得到充分训练的军队部署到一个对它充满了憎恨的地区。这些憎恨和抗议者产生的愿意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安全部队自身。这些部队一直在驱赶逊尼派的人，将他们送进监狱，很多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就被处死了。

问：美国在这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答：美国人很难扮演积极的角色，因为在大部分伊拉克人看来，他们已经离开了。美国政府已经很明确地表示这不是美国的战争，他们想把这场战争放下。很不幸，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他们的战争”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这句话不仅取悦了伊拉克人，而且取悦了一直在进行这场在战争并且在费卢杰和安巴尔付出了生命代价的美国人。没有伊拉克人会希望美国军队回来，但是想要得到的是一些支持，一些政治上的帮助。在费卢杰和其它一些地区，人们担心美国政府部署的武器会被用来对付他们。伊拉克安全部队力量仍然很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美国人离开之后，它失去了一部分情报能力。美国人带走了技术和专家，而且也没有训练伊拉克人去做那些工作。现在他们所做的是增加他们在反恐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因此他们同伊拉克共享更多的情报，他们也伊拉克军队进行定位，进行监控。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取代美国军队离开之前一直在发挥作用的体系。

本文原题为“Iraq’s High-Stake Struggle”。本文作者伯纳德·韦格茨曼(Bernard Gwertzman)为外交政策委员会咨询编辑，被采访者珍·阿拉夫(Jane Arraf)为《基督教箴言报》资深记者。本文于2014年1月9日刊于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为中国三叫好

Robert Manning/文 彭成义/编译

导读：在几乎无人称赞奥巴马政府的能力和战略时，东亚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导致美国亚太政策的“重大胜利”。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尤其是它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举措。中国的行动为美国提供了调动以美为核心的亚太联盟积极性的机会，促使美及其盟友和伙伴加速提升各自海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唤醒了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与之作对，并加强各自的防务。编译如下。

在几乎无人称赞奥巴马政府的能力和战略的时刻，东亚最近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克里的东南亚之行，意味着美国亚太政策的重大胜利。这一切事态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中国，尤其是它在东海和南海争议岛屿问题上的强硬和民族统一主义行为。中国最近在东海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存在主权争议的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引发了各国迅速而愤怒的反应。美国派 B-52 轰炸机飞越该区域，首尔扩大了其防空识别区，而东京增加了空中存在。

北京的鲁莽行动给美国国务院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调动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联盟的积极性的机会。对北京会继续在南海争议区域划设类似的防空识别区担忧，是美国及其东南亚盟友和安全伙伴们目前加速提升各自海洋能力的一个因素。国务卿克里重申，美国反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呼吁中国“不要在本地区其他地方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尤其是在南海”。

克里承诺向菲律宾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海洋军事援助，以提高马尼拉的海洋防务能力。此外，美菲正在就在菲律宾轮换驻军展开谈判。1992 年之前，美国一直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驻军。

在宣布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之后，美国又宣布向东南亚国家提供 3200 万美元的海洋援助，帮助他们提高海岸巡逻和侦察能力，其中 1800 万美元提供给了越南，用于为该国海岸警卫队购买快速巡逻艇。这一切将提高东盟国家在南海的海洋侦察和监视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公开披露美国“考彭斯”号导弹巡逻舰与正在南海执行训练任务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一艘护卫舰险些相撞的事件。这起事件是日益紧张的海域内擦枪走火的风险增加的又一例证。

同时，日本内阁批准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五年防务计划，标志着日本在二战后的地区角色的转折点。根据该计划，东京将向正常国家的方向迈进，追求所谓的“为和平作出积极贡献”。这极有可能还包括对日本宪法进行有争议的解释，允许东京积极参与集体防卫。

在防卫领域，该计划说，从 2014 年到 2019 年，防务开支将增加 5%，从根本上提高其海上和空中能力，旨在构筑“动态联合防卫力量”。日本的新防务指针旨在深化日美安全合作，并使日本在日美联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计划为海军增加 7 艘驱逐舰（其中包括两艘具备导致防御能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这将使该国的驱逐舰总数达到 54 艘。日本还将把潜艇编队数目增加到 22 艘，新增 6 艘潜艇，并购买新的两栖登陆车。此外，日本还将购买 28 架 F-35 隐形战斗机和数架无人侦察机。

新的防卫指针反映了日本战略的变化，它显然旨在提高该国保卫东海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本刊注）乃至更大区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南方诸岛的周边安全。中国也宣称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并在不断增加尖阁诸岛周边的军事和准军事海上及空中活动，企图破坏日本对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的实际控制。

日本的动态防卫概念，还延伸到与东盟国家和印度的安全合作，这预示着，一个对抗中国不断扩大的战略脚印的地区安全网正在逐步成型。这反映了一个更远的趋势，这从现代亚洲防务（目前达到 2870 亿美元）开支首次超过欧洲就可见一斑。

日本新防务指针的墨迹未干，中国就作出了意料之中的回应。通常代表官方立场的中国新华社说，日本的新安全计划堪称日本安保政策和理念的根本性转折。而这也标志着危险的“安倍军事学”正式粉墨登场。其他中国媒体更进一步指出，这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在复活。

公平地说，日本不能正视其不光彩的历史，以及日本官员时不时地想要修改历史，仍令亚洲和美国很多人担忧。即使如此，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谋求发挥一个正常国家的作用，总体上也应该受欢迎。不管中国怎么抗议，日本的国防开支，即使加上这为数不多的增长，也只有 590 亿美元，而且主要用在防卫方面，而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为 1150 亿美元，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超过 1660 亿美元。

把两周内所有这些事件联系到一起，便可看到不断加深的东亚安全困局，20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一直在规避不稳定。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的企图和长期作用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是对美国的安全存在的持久性的担忧，美国及其联盟网络和安全伙伴，一直是本地区的一支重要稳定力量。

北京为什么会认为这种制造新事实、改变现状的强硬行动，符合自己的长期利益，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显然完全不符合古代军事家孙子的思想。然而，目前中国已经唤醒了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与之作对，并加强各自的防务。事实上，这正在助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一臂之力，并有助于提高安全伙伴的能力。为中国三叫好。

本文原题名为“Three Cheers for China”。本文作者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obert A. Manning。本文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发表于 The National Interests 网站。编译的材料皆来自网络。[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伊朗副外长有关伊核问题的演讲

Majid Takht Ravanchi/文 丁工/编译

导读：11月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所做的演讲报告，塔赫特·拉万奇是伊朗外交部负责欧洲和美国事务的副外长，同时还兼任伊朗核问题谈判小组的领导人，现将该文编译如下。

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在演讲中表示新近赢得选举，就任伊朗新总统的哈桑·鲁哈尼将促进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建设性参与和营造良好的地区关系。他强调指出伊朗一直保持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冲突中的安全关切，并表示伊朗将特别关注极端宗教暴恐势力崛起引发整个地区格局进一步朝向动荡、破碎发展的趋势。

塔赫特·拉万奇建议冲突地区的邻近国家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互信措施，通过对话和合作机制应对地区性安全威胁。他还呼吁有关各方摒弃“零和思维”的政治安全观，他认为如果零和安全观在各国处理地区事务中广泛流行，必将会极大地削弱区域国家构建冲突解决机制的努力。塔赫特·拉万奇副部长还特别强调政治手段解决当前持续的叙利亚冲突的必要性。塔赫特·拉万奇表示虽然伊朗支持由联合国召集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最新一轮和谈，但他更倾向于不对和平前景报太大奢望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叙利亚反对派并非是一个整体，将不同背景的参战各方集合一起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伊朗核问题，塔赫特·拉万奇则指出在最新一轮伊朗同伊核六国（P5+1）的维也纳会谈之后，伊朗在核谈判进程中关于国家核开发计划的主要目标，已经转变为努力实现对话双方的共赢创造条件。维也纳会谈能够达成过渡性临时协议是非常困难而且很耗费时间的工作，但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按照协议规定，伊朗保留了能源用途进行铀浓缩的权利。作为交换，伊朗将通过增强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的合作，向国际社会做出履行协议内容的信誉担保，并依此换取部分解除制裁措施。

依据自身在参加伊核谈判中的过往经验，塔赫特·拉万奇指出了伊朗和伊核六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达成全面核协议存在的两大障碍。首先，考虑到最近达成的维也纳协议的临时性和过渡性，该协议实际上还遗留许多重要的有争议性问题需要后续在谈判中进一步澄清解决。但是由于与会各方缺少彼此相互信任的基础和对随后谈判将最终朝向何方缺少共同的认识，这些因素决定下一阶

段谈判将会比刚达成的协议困难许多。事实上，眼下各方还未就一项全面协议应该强制执行多久形成共识。

其次，塔赫特·拉万奇注意到美国和伊朗国内的主流政治势力都是用怀疑和猜忌的眼光看待最新达成的核协议，这必然会影响到谈判团队的工作，从而给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的前景增添更多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

本文原题名为“SIPRI hosts lecture by Iran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奇 2013 年 11 月 28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做的演讲。[单击此处查看原文。](#)

本期智库介绍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 1921 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 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24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7 名。

网址：<http://www.cfr.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4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5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3 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 28 个国家的 237 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 是 CEPR 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EPR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27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18 名。

网址：<http://www.voxeu.org/>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

简介：RIS 是印度外交部所属的独立智库，专注于国际经济问题及发展合作方面的政策研究。它还承担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能力建设及开展有效政策对话的论坛职能。RIS 的工作计划旨在促进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各种论坛的多边磋商提供支持。RIS 也为印度政府与合作伙伴缔结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提供政策分析。

网址：<http://www.ris.org.in/>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 1981 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2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15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3 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2 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150 大智库中列第 19 名，全球 8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5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7 名。

网址：<http://www.cato.org/>